

政治生态建设的中国语境与逻辑理路*

陈 朋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建设必须考虑中国语境、遵照中国逻辑。拓展巩固执政地位的战略资源、为腐败治理提供有力支撑、推动政治生态正向演替是中国政治生态建设应当考量的现实语境。但是，圈子腐败、潜规则、为官不为等突出问题显露出当前政治生态异化的现实景观。充分考虑历史传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推动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轨迹、直接回应现实问题、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最高准则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须当遵循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价值逻辑。基于此，以加强党的领导为轴心、以优化权力结构为基础、以制度体系建设为主线、以锻造良好政治文化为支撑是当前政治生态建设理应坚持的基本进路。

【关键词】政治生态 执政地位 腐败治理

作者简介：陈朋（1979-），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04）。

在一个追赶现代化浪潮的国家，政治发展不仅具有重要地位，而且承载着双重期待：既要建构有效的权威体系以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又要优化权力结构以凝聚更多的发展共识。但是，政治发展本身不是孤立存在的。从其内部构成看，它是由各种政治要素耦合而成、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从外部依存条件看，它与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等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其赖以生存的政治生态。因此，在讨论政治发展问题时，不能忽视政治生态。然而，任何国家的政治发展都是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产物。对政治发展发挥重要支撑作用的政治生态也是如此，它总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中国的政治生态建设只有置于中国语境并寻求契合中国实际的逻辑理路，才能准确把握其核心命题。

一、政治生态建设：现代政治发展的内在需求

人类政治实践经验表明，政治发展是伴随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而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作为政治变迁过程，政治发展既是一定政治共同体实现自身整体进步的必备支点，也是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完善自身构造的必然选择。”^①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政治发展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进入现代社会，政治发展对三大要素提出了明确要求：健全完善的权力结构、科学合理的制度规范和具有明确指向的价值体系。权力结构规制着政治发展的基本格局，制度规范影响着政治发展的实现方式，价值体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课题“一把手权力腐败治理与政治生态建设研究”（17DJB038）的阶段性成果。

① 张明军、陈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前提与创新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系预设着政治发展的目标取向。这三者对政治发展同步实施影响。因此，一个试图实现良性政治发展的现代国家，总是着力实现上述三大要素的有效型构。但是，这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权力结构的选择和形塑要受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国家性质的双重影响，制度规范则浸润着政治主体的价值取向，同时又反过来进一步形塑着价值取向。由此可见，任何政治发展都以现实条件为基础，受外在各种要素和综合环境的影响制约。这里的现实条件、各种要素和综合环境就是维系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生态。历史和实践早已证明，“不同国家在其政治发展进程中之所以形成种种差异，或者说，不同的国家之所以采取了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不同”^①。也就是说，政治发展具有较强的受动性，它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的结构构成、风土人情以及政治主体的综合素养等生态要素密切相关。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及功能的发挥并不是由个人意愿随心所欲决定的，而是由一系列复杂的生态要素所影响和制约的。政治发展受制于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影响和左右着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与政治生态之间保持着动态平衡的关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政治发展只有浸润在一定的政治生态中才能形成自己的品格和特质，政治生态的使命就是通过锻造良好的关系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最大限度地满足政治发展对环境的要求，引导权力沿着健康规范的方向运行，进而促进政治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

那么，到底什么是政治生态？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政治生态源于政治学研究者对“生态学”概念的借鉴和参考。较早使用生态学这个名词的是勒特。但是，真正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概念来阐释的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1869年，恩斯特·海克尔在研究生物体的进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时认为，任何生物体的进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要受周遭环境的影响制约。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在这些生物学者看来，各种生物有机体之间及其与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是自然生态系统。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生态学的概念逐渐为其他学科研究所借用。比如，在观察分析政治现象时，政治学者认为，政治主体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社会结构、风土人情等多重因素紧密相关、相互作用，进而构成一个有机生态系统。基于此，政治学者沿袭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分析政治现象、政治行为。这就是政治生态理论与方法的学理缘起。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日渐形成了这种共识：政治生态研究主要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和整体的视角来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它对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政治系统与外部各要素之间错综复杂而又相互关联的关系状态进行分析，对政治行为失范、政治生活的基本状态提出生态层面的解释。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政治生态论主张用联系的、系统的观点来看待和分析政治现象，将政治发展的基本状态和未来趋势、政治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及因此而展现出来的政治风貌与政治系统、政治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看作一个相互融合的有机生命体。显然，政治生态实际上强调的是两种关系形态及其建构：其一，政治系统内部的关系状态。恩格斯在阐述事物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紧密联系的观点时就提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② 政治系统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交织场景，政治行为主体要作出某种选择，必须将自己置于系统之中。政治发展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任何政治系统都存在内在生态关联，政治体系的内部结构，往往是塑造一个国家政治生态的决定性要素。对于这种内生态，刘京希教授将其定义为“政治体系内生态”，主要表现为中央与地方、上级

① 桑玉成：《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生态问题》，《学术月刊》2012年第8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

与下级以及立法与行政、立法与司法、行政与司法等之间的关系形态,以及其他各亚体系围绕体系主体进行良性协调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状态。对于中国而言,政党、人大、政府、政协等组成的权力结构,是构成中国政治生态内部结构的重要元素,由其构成的政治体系成为中国政治生态的直接呈现。当然,也不能忽视政治制度、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文化等政治系统内部其他要素的总体关系及其平衡状态对政治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比如,不同的政治文化形成不同的政治心理,激发政治主体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作出不同的行为选择,结合实际构建不同的政治制度,进而形成不同质态的政治发展。

其二,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状态。其实,注重考量外部环境对政治行为及政治现象的影响作用,早就为政治学研究所关注和重视。比如,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政体选择时就提出:“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成城邦所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必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①这里所蕴含的就是政治生态对政体选择的深层影响。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则说得更为直接:“政治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②他在这里所强调的也是自然环境和政治生态对政体差异所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不同的环境形塑着不同的生态,不同的生态又产生不同特质的政体。伊斯顿所强调的“政治系统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它作为一个有机体又成为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③指的也是这个层面的含义。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整个政治系统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等诸多外在因素密切相关。一个国家的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历史传统因素乃至国际因素都是影响政治发展的外部因素。政治不能脱离这些外部环境而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任何政治都是政治体系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二、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生态建设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促使政治系统内部及其与社会环境之间形成互为对方的支撑要素,并在两者的互动中形成合作互惠的生态关系,是政治发展和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规律。但是,实际上任何国家的政治生态建设都与其自身特定的社会结构有关。因此,当前在讨论中国的政治生态建设时,既要遵循其基本规律也要廓清和辨识其中国语境。从总体上看,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拓展巩固执政地位的战略资源

在传统社会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由于现代政治生活的复杂性,政党政治便具有现实必要性。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政党政治也是建构而成而不是自发产生的。在其建构过程中,特定的政治生态及其所形成的政治风气、政治导向都会对政党政治的形成及基本面向发挥潜移默化影响和制约。正如此,一个成熟型的政党,往往会把良好的政治生态当作巩固其执政地位的重要战略资源,进而适时监控政治生态是否发生变异,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适应性调整和有效性治理。

当代中国国家政权的建构逻辑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正所谓,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论是从政治体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79页。

②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7页。

③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制和政权架构，还是从实际影响力、凝聚力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指挥中枢。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但是，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体现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这一显著特征内在预设着它必然会全方位地调控和影响国家政治发展，包括政治体系的设计和生态的构造。同时也决定了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成效与好坏均维系于执政党的组织生态，反过来政治生态的整体水平亦直接影响着执政党的战略资源。然而，执政资源的获取与巩固不是一劳永逸的。特别是在长期执政的环境下，一些主客观原因导致的危险因素也随之滋生并不断侵蚀执政党肌体。其中，一个突出的危险就是政治生态的恶化。检视实践发现，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形形色色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形态各异的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都是政治生态异化的典型形态。它们对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资源构成严重侵蚀。如果任其泛滥，“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①。显然，这种情况必须予以改变。可喜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舆论等手段对政治生态环境进行能动的治理和改造，使其成为政党长期执政所需的相互依存、共生共长、和谐共进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②。也正因此，中国共产党把政治生态建设当作影响其执政地位的命脉工程来抓，其主要出发点就是阻断政治生态的污染源，消除政治生态的痼疾，防止政治生态持续恶化，最终为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战略资源。

2. 为腐败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腐败不仅是政治的毒瘤，而且是执政党的最大威胁。因此，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如何实施有效的腐败治理都成为各国执政者必须认真应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更是如此。先建立政党再来建构国家与政党关系、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现实环境特别是正面临社会转型的多重焦虑，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妥善应对消除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这一重大课题。但是，中国共产党在腐败治理方面采取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方略，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依靠在野党之间的相互攻讦、相互揭短而闹得鸡犬不宁，也不是仅仅依靠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而是采取既治标又治本的策略。实施这一方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政治生态建设。正如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所强调的：“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反腐败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③由此可见，政治生态建设被寄予为腐败治理提供有力支撑的重任。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生态建设具有双重属性，既可以将之看作治标手段，也可以将之看作治本之方略。就治标而言，它能净化“从政环境和社会风气”。比如，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指出：“改进作风，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④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抓好政治生态建设。深刻洞察之，其主要出发点就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宏大背景下，通过净化政治生态来改进作风，进而为强力反腐提供有力支撑。但是，政治生态建设的更重要意蕴在于从文化层面寻找腐败治理的治本之策。在一定程度上讲，政治生态亦属于文化的范畴。文化是能对行动主体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构成强大影响力的场域。正如长期研究政治文化的阿尔蒙德所言：“作为政治角色的人的行为、思想无一不受到文化场域的影响。”^⑤习近平多次指出：“党内

①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第75页。

② 牛君、季正聚：《试析政治生态治理与重构的路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4期。

③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④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第6页。

⑤ [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G. 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371页。

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活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①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文化的影响和浸润是非常明显、非常强劲的。这一特性决定了政治文化必然构成政治生态的底蕴和本色。对于政治生态而言，无处不在的政治文化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因此，政治生态亦是一种政治文化，浸润着政治文化的影响因子，体现出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政治文化的变异必然带来政治生态变异。比如，当前在有些领域大行其道的潜规则、圈子文化、信念缺失、私欲膨胀，实际上就是一种落后的政治亚文化。而这些都是腐败的深层土壤。因此，要从根本上预防腐败，就必须从政治文化层面寻找切入口。这正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在腐败治理过程中强调重视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不可否认，在当下中国，通过严惩腐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对政治生态产生明显负能量的不良情绪。

3. 推动政治生态正向演替

政治生态是静态与动态要素的耦合体，绝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历史上，“守旧拒新、以中抗西，曾经是中国政治生态无法维持稳定的重要导因”^②。但是，从当下情况看，中国政治生态正呈现出一种良性演替的趋势发展，这种乐观的情景给人以积极的预期。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伟大实践，使中国政治生态正在民主与法治的合力促进下逐渐稳定成型，并与当前政治发展的总体需求保持大体均衡。这也是当前中国政治发展在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还能保持总体向上态势的重要原因。但是，其前进的道路并非一路坦途，当前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复杂性也是人所熟知的。特别是传统与现代、积极与消极、正向与反向等各种因素仍然尖锐地存在于中国政治生态中，共同对当前政治生态建设施加拉锯式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生态各要素之间经过不断磨合，是朝着积极方向前行还是维持原地不动甚至走向恶化，客观而言都面临着一些不确定因素。此时，哪方力量稍胜一筹，政治生态的演替方向就会偏向哪一方。显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自然期待并通过不断努力推动政治生态实现正向更替。

这正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要加强政治生态建设，并着力打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重要原因。对于中国政治生态建设来讲，风清气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愿景。具体而言，就是体现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人是政治生态建设的主体，其品性和品德对政治生态的基本风貌产生着直接影响。所以，干部清正是政治生态建设的首位要素。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责在于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因而，对人民群众负责、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其基本行动准则。清明则是指政治体系和政治运行过程是公开、透明、清晰、规范的。而无论是干部清正，还是政府清廉，抑或是政治清明，它们所表达的都是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生态建设的理想预期。因而，自然成为中国政治生态建设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

三、当下中国政治生态的突出问题及其实际状态分析

如果说拓展执政资源、巩固执政地位、助力腐败治理等预设了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内在规定性，表达了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目标期待。那么，在此基础上，则要对当前政治生态的客观面貌作出审视。从总体上看，当前政治生态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是局部仍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突出问题。对此，有学者用变异、异化来形容。虽然概括各不相同，但基本感知是一致的，都认为政治生态存

①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

② 任剑涛：《政治生态的中国现状与结构优化》，《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2期。

在一些异常现象，这些异常现象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破坏性影响必须引起重视。这些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极易产生政治雾霾的圈子腐败

作为社会性动物，每个人都处在一定圈子之中。朋友圈、同事圈、亲人圈等都是人们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团体。圈子给人以精神体恤、情感抚慰。然而，当人们持以不良目的而聚集在一起时，圈子就会变异。比如，当权力、资源与需求高度融合而又缺乏监督制约时，一种特殊的腐败形式——圈子腐败就会产生。反观当前，在高压反腐的重拳出击下被掀开的“石油帮”“秘书系”，以及“一牵一大串、一动就塌方”的区域性腐败等，都是其典型形态。无数案例表明，这些圈子腐败对政治生态的破坏非常直接。

就政治生态与圈子腐败的关系看，两者之间存在二元耦合式的双重关系。其一，政治生态恶化是产生圈子腐败的重要原因。在一个健康的政治生态里，权力运行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利益诉求的表达和满足也都是规范有序的。但是，在一个生态变异或者说恶化的政治环境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政治系统的建构、政治权力的运行、利益诉求的表达、政治资源的分配都是在非正常渠道内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目的，便通过血缘、地缘、业缘等抱团结成圈子，以寻求共谋性行动。腐败也正是因此而生。其二，圈子腐败会进一步加速政治生态恶化。如前所述，圈子腐败之所以形成，主要是因为是在恶化的政治生态环境里，人们试图通过非法途径来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如何实现利益？其主要策略就是缔结庇护关系。庇护，原本是人类学的概念，“作为一种非正式关系安排，庇护关系的形成和维系在于互惠互利的利益交换性和彼此之间信任和忠诚的感情融入”^①。随着实践不断发展，庇护关系也逐渐进入政治领域。而一旦形成庇护关系，参与者就会把权力与资源、利益打造成一种在彼此之间可以交换的东西，进一步加剧政治资源的稀缺和政治权力不规范的运行，继而使圈子腐败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

2. 破坏正常交往的“潜规则”

“不以规矩，难成方圆。”人们总是期待能用规则来约束和调整人们之间的交往行为和关系建构。因此，在一个良好政治生态里，规则的价值和被遵循程度都是很高的。但是，在一个受到严重破坏的政治生态里，规则却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处处流行的却是“潜规则”。“潜规则”是相对于显规则而言的。它虽然不是成文的刚性约束，但是以风俗、习气、约定俗成的看法或行为等形式广泛存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继而成为一些人默认的行为方式。正如吴思先生所言，“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这种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规矩，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②。“潜规则”不像“明规则”那样需要“走程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而是引诱人们通过走捷径的方式来实现目的。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四风’问题越积越多，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根子就在从严治党没有做到位。”^③这里所指的就是“潜规则”对政治生态的负面影响。

近期，笔者在一些重大专题调研中重点考察了政治生态的受影响因素。数据分析发现，在回答

① 吴海红：《利益共同体的缔结：官场庇护关系的形成机理分析》，《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3期。

② 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236页。

③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0月9日。

“当前政治生态受到破坏的突出表现有哪些”的问题时，46.4%的受访者选择了“较为盛行的潜规则”。其占比仅次于“圈子腐败”。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人不相信按规章制度办事，而是寄希望于“走后门”，甚至“网开一面”；在干部选拔中，有些人不相信组织，而是倾向于拉关系、“架天线”、搞攀附，“能力强的不如关系硬的，会干的不如会说会拍的”。由于这种潜规则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会产生连锁性的效仿反应。因而，极易对一个地区或行业产生雾霾性的污染和破坏。

3. 消极慵懒的为官不为

客观而言，为官不为并不是当下才出现的问题。它本身是权力的衍生品。只不过，近年来这个问题陡然凸显起来，并且不断蔓延开来。为官不易、官不聊生、当官没意思等论调即是部分领域的新生态。从其形态看，“为官不为”有多种表现形式。习近平将其概括为三种情况：“一是能力不足而‘不能为’，二是动力不足而‘不想为’，三是担当不足而‘不敢为’。”^①这就是当前不作为政治的基本形式。其典型特征是慵懒、颓废、消沉、懈怠，缺乏干事的动力和劲头，患得患失，畏惧艰险，奉行“宁肯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也要不出事、少惹事”的行为方式和行动逻辑。

如果说过去的不作为问题主要集中在没有“油水”的利益稀疏区，那么现在则转移到干部选拔、资源配置及开发、项目审批等极易产生权力寻租和风险高发的利益密集区。过去，这些领域被认为是实权地带，容易成为被“围猎”的对象，继而容易引发塌方式腐败、圈子腐败、政商关系畸形等生态恶化现象。现在，有些人为了规避所谓的风险，便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采取“门好进，脸好看，事依然难办”的消极策略。但实际上，无论是用腐败的方式来“有效作为”，还是为了逃避腐败风险而不作为，都是对政治生态的破坏。打着作为的幌子来腐败，自然是对政治生态的直接破坏。同样，不作为也是腐败。事实证明，对政治生态的破坏不仅仅是指制造乌烟瘴气的不良风气，让公众体会不到应该享受的公共服务，对执政公信力的侵蚀同样是对政治生态的污染。而且不作为政治具有传染性，极易形成集体感染的政治生态反应。一旦被模仿，其结果必然会诱发产生政治生态的内卷化风险：让政治生态建设既不能形成有效突破，也不会发生颠覆性倒退，而是进入简单循环、原地踏步的状态。

四、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逻辑进路

客观存在的问题对一个时常保持警醒意识的政党来讲，总会促动其重视并努力探寻有效解决办法。对于当前政治生态遭受破坏的现实景观，中国共产党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②。值得庆幸的是，政治生态具有修复和再造的双重特性。而且这种修复和再造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相互交织和彼此融合的。当前讨论中国政治生态建设实际上就是指对其进行修复和再造。

但是，如前所述，任何政治生态都生长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中国的政治生态建设必须考虑中国语境，遵照中国逻辑，探寻适合中国实际的进路。在其语境背景已然清晰的情况下，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逻辑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对此，从总体上看，需要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价值逻辑这三大层面考虑。就历史逻辑而言，正所谓“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要坚持历史连续性，充分考虑历史传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推动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

①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7页。

轨迹及其发展变化逻辑。但是，对历史的尊重并不是说完全照搬、全盘复制历史经验，而是一个自然的顺应过程，让政治生态建设顺应自身的历史演进逻辑、契合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简言之，既要着眼于新的时空环境变化又要坚守历史传统优势。就现实逻辑而言，就是要准确探测和直接回应现实问题，否则就是无的放矢。比如说，要看到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对政治生态建设形成的刺激和推动。尤其是要看到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需求，以及因此而引致的政治主体的思维观念及行为方式的变化对政治生态建设带来的新促动。就价值逻辑而言，它强调的是政治生态建设的价值目的性和目标旨归。中国的国家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内在地预设了当代政治生态建设要以廉能为目标指向和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最高准则。也就是说，营造风清气正、廉洁高效、廉而有为的良好风尚以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全部实现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目标归宿。无论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理念、行动逻辑，还是评估标准和具体策略都应以此为出发点。

特定的语境背景和基本逻辑必将从深层次规定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进路。从主要进路看，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但是以下四个方面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工程。

1. 以加强党的领导为轴心

政党政治的形成与发展受制于一定政治生态，同时反过来又影响并型构出相应的政治生态。因此，在讨论政治生态建设时不能忽视政党政治的影响。在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必须坚定自觉坚持党的领导”^①。这就意味着，政治生态建设必须始终把坚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放在首位，以加强党的领导为轴心。具体而言，就是抓好两点：其一，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为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出发点和目的归宿。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不是出于别的什么考虑，而是着眼于检视党自身建设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而寻求有效突破，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丢弃这一点，营造良好风尚、维护群众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都将丧失根基。其二，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政治生态建设始终。如果说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为政治生态建设的出发点是从静态入手，那么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生态建设的全过程则是一种动态眼光，它直接决定着政治生态的基本方向和实际成效。

2. 以优化权力结构为基础

政治生态之所以恶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共权力发生异化，蜕变成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的工具。正所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直至遇到有边界的地方为止。政治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和代谢过程的紊乱，既是权力腐败所致也是其必然结果。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特权思想等直接造成政治生态雾霾效应的行为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权力被看成无所不能的“硬通货”，继而利用权力大搞利益交换和人身依附。因此，当前在政治生态建设过程中，必须着力优化权力结构。但是，由于国情不同，调整优化中国的权力结构不必定于一尊。西方国家的那种“三权分立”制度，已经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不适宜于中国。当下中国所要坚持的就是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具体而言，就是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同时，以公开透明为目标，着力推动权力运行的公开化、透明化、规范化。在权力的监督制约上，则要实现以权力约束权力、以权利监督权力、以法治监督权力的有机融合。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2页。

3. 以制度体系建设为主线

在政治生活中，制度是影响人们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从其本质意义看，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们由正式规则（成文法、普通法、规章）、非正式规则（习俗、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以及两者执行的特征组成”^①。简言之，制度是调整和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规范。一些地区或领域的政治生态之所以恶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体系不健全或执行力不强，形同虚设。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其主要出发点就是编织严密的制度笼子，让破坏政治生态的行为失去生存的土壤。从当前情况看，围绕政治生态的制度体系建设，亟待突破的地方主要在两个方面：制度体系的数量供给和质量提升。数量供给，即是指从数量上确保有章可循，而不至于无据可遵。但这不是单纯地指制度数量的扩张，而是包含削减、整合、清理等意蕴。质量提升，即要提升制度的执行力。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表明，制度的效度与其执行力之间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共同展现制度体系建设的整体面貌。因而，在制度体系建设过程中，要从巩固制度的群众基础、提升制度的社会认同度、加强选择性激励等方面大力提升制度的执行力。

4. 以锻造良好政治文化为支撑

从政治系统内部构成看，政治生态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其中，既有政治制度、权力结构、政策法规等硬性因素，也有政治价值、政治心理、意识形态等软因素。这些因素对政治生态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很多时候其影响作用更为深沉和久远。古今中外的政治实践表明，每一种政治行为、政治生态都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之间的适应性是保证政治健康发展有序运行的基础。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生态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两者相辅相成，政治文化构成政治生态的内在规制因素，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此，在政治生态建设过程中，锻造良好的政治文化至关重要。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的部署是“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②。具体而言，就是要从优化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层面入手，并寻求有效突破。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 [3]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
- [4]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
-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
- [6] 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

（编辑：张晓敏）

① [美] 道格拉斯·C.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3页。